

【理论探讨】

以《圣济总录》为例解构宋以前肾脏辨证论治特点*

谷建军¹, 任路^{2,3Δ}

(1.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 北京 102488; 2.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, 沈阳 110032;
3. 中医脏象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 沈阳 110032)

摘要:《圣济总录》全面总结了两汉隋唐时期到宋代的肾脏辨证论治体系,其肾脏证分为肾虚、肾实二证。宋代已经开始从本元辨证,以肾为元脏,重视补元气、壮元阳法,体现了耑肾思想,在辨证论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;肾脏辨证虽然延续了早期虚实辨证方法,但更重视虚证、轻视实证并出现虚热辨证,扩大了虚证范围;重视肾藏精,以益精髓为先;未见明确的肾阴虚证概念,相关病证多存在于肾实证中,肾阴虚证辨证体系尚未建立。《圣济总录》中命门未参与肾脏辨证,至金代以后分化出命门辨证,使命门藏精思想与临证应用相衔接。宋代肾虚证与今肾阳虚证相似度较高,肾实证与肾阴虚证则差异较大,彼时正是肾脏辨证论治理论方法的重要转型期,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

关键词: 圣济总录;肾脏辨证;元气;肾阳虚证;肾阴虚证

中图分类号: R256.5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2)11-1773-04

DOI: 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20509.001

以宋代为分水岭,脏腑辨证的演变史基本可分为两个阶段,两汉至宋代一直沿用《黄帝内经》的辨证方法,采用较为简洁的虚实辨证模式,较多体现了早期方证对应的特点,是为第一个阶段;宋以后医学开始了对藏象体系的全新演绎,脏腑结构功能有很多新的发展,辨证方法也愈发复杂,是为第二个阶段。《圣济总录》是宋代官修医著,汇编了历代医籍和民间验方,尤其是全面整理了宋以前藏象体系的有关内容,是对早期脏腑辨证以及论治的系统总结。本文从此书《肾脏门》入手,详细解构《黄帝内经》以后至宋代的肾脏辨证论治基本状况,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这一阶段脏腑辨证的主要特点。

《圣济总录·肾脏门》共三卷,即第五十一至五十三卷,第五十一卷开篇为《肾脏统论》,述及肾的经脉、表里脏腑、所主色味气臭等,尤其说明了肾脏证的分型、表现和治则,随后分别是肾虚、肾实、肾寒、肾胀、肾着、解休、痞俳等病证。肾脏证分为肾虚、肾实二证,肾虚证主要表现有关格塞、腰背强直、饮食减少、气力疲乏;肾实证则见少腹胀满、小便黄赤、未有余沥、数而痛,各证下皆设有具体病证表现与方药。

1 肾脏证的辨证特点

1.1 从本元辨证,体现耑肾思想

宋代医学极为重视“元气”概念,在辨证论治中

广为应用,这一特征在《圣济总录》中体现得非常鲜明。《圣济总录》以肾藏元气,将肾称为“元脏”。《圣济总录·卷第二百·神仙服饵门·神仙炼丹》论调养五脏云:“凡人须先养脾,脾王则肝荣,肝荣则心壮,心壮则肺盛,肺盛则元脏实,元脏实则根本固,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也。”^{[1]2339}书中元气又有天一、下元、肾元、真元、元阳、真阳等种种称谓。如《圣济总录·卷第一百八十五·补益门·补虚固精》云:“肾主水,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。所谓天一在脏,本立始也。”^{[1]2095}“天一”一词源于《河图》“天一生水”,肾为水脏,故其所藏元气有此别称。肾藏天一本元,《圣济总录》这一思想出自宋徽宗《圣济经·卷七·守机篇·通用时数章》云:“肾藏天一,元气属焉。人非天一,无以立本。”^{[2]118}肾属水,天一生水,“太极元气函三为一”^{[2]35},天一即指元气,肾藏元气为生命之本。

“元气”一词首见于《难经》,又称“原气”“肾间动气”。《难经·十四难》云:“脉有根本,人有元气”^{[3]32},并将肾与元气相联系,以右肾为命门,主系原气。《难经·三十六难》曰:“肾两者,非皆肾也。其左者为肾,右者为命门。命门者,诸精神之所舍,原气之所系也,男子以藏精,女子以系胞。”^{[3]62}《难经·八难》又以原气为肾间动气:“所谓生气之原者,谓十二经之根本也,谓肾间动气也。”^{[3]24}隋·杨上善极为重视肾间动气,在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中多处提到这一概念。如《黄帝内经太素·卷十四·诊候·真脏脉形》说:“肾间动气,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原”^{[4]212},“肾间动气乃是身形性命之气”^{[4]281},但隋唐时期临床医学却极少关注“元气”,也基本不用于辨证论治。如《千金要方》专门讨论了脏腑辨证,但全书仅3处提到元气,皆论养生调气之法,书中亦未见《圣济总录》的天一、下元、肾元、真元、元阳、真阳

*基金项目:国家重点研发计划(2018YFC1704300)、“肾阳虚证”核心病机、辨证要素与证候辨识标准研究;辽宁省特聘教授项目(辽教发[2015]153号);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(辽教函[2018]479号)-中医药情志病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

作者简介:谷建军(1970-),女,黑龙江绥化人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藏象学术史中医哲学史研究。

Δ通讯作者:任路(1966-),女,四川巴县人,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五脏功能协调为基础的中医情志病研究, Tel:13700016613, E-mail: lnzyxkc@sina.com。

等相应名词。唐代王焘《外台秘要》也基本如此,表明“元气”广泛参与临床辨证是从宋代始,尤其肾脏辨证多从本元出发,与隋唐时期有本质区别。

宋徽宗崇信道教,养生主张无为,在针对肾脏的保养上提出了“啬肾”思想,肾藏精过用则竭,故“专以啬之可也”^{[2]7}。《圣济总录》亦从之,《圣济总录·卷九十二·白淫》说:“夫肾藏天一,以慳为事,志意内治,则精全而啬出。”^{[1]1098}慳,吝啬之意。《圣济总录》很多疾病皆用“补元脏”“补元气”“补真元”之法。如《圣济总录·卷一百八十七·补益门·补益诸疾》说气血以“肾为之本”,若“本脏虚损,则气血从之,动辄生疾”,故“治虚损诸病,大补益元脏”,用天雄丸、乌头丸、鹿茸丸、山芋丸^{[1]2126-2128};治“元脏伤惫”,补虚冷、调元气、壮筋骨、明耳目,有草还丹、小还丹、椒红丸等方^{[1]2121}。《圣济总录·卷第八十九·虚劳门·虚劳腰痛》,论此病机制是“劳伤于肾也,肾主腰脚,若其气不足,风邪乘之,故令人腰痛引少腹,不可以仰息”^{[1]1057}。其中寸金丸方主治“虚劳腰膝无力,元气虚惫”,见行步艰难,腿股疼痛;肉苁蓉丸方主治“元脏气虚,脐腹紧痛,腰脚少力,行步艰难”等症^{[1]1057}。《圣济总录·补益门》还专设《补壮元阳》一篇,针对阴阳伤惫之疾、气血虚损之证,责之于“劳动妄作,嗜欲过度,戕真太甚”^{[1]2097},下设 14 条方证,用方有椒附丸、草四神煎、楮实丸等。这些辨证多从虚论,以补法为主,实证极少,也充分体现了啬肾思想在辨证中的指导意义。

1.2 重虚证,轻实证

宋以前脏腑证主要有虚实两种形式,虚证又称虚寒、虚冷,实证又称实热。如肾脏证,一为肾气实,又称肾实热;一为肾气虚,又称肾虚寒。《圣济总录·肾脏门》也沿用了这种分类法,分别称“肾虚”“肾实”。《圣济总录》脏腑证虽然仍旧沿用虚实分类法,但综合来看还是更加重视虚证,其论虚劳骨蒸的形成曰:“脏腑之病,变态多端,万病皆生于虚”^{[1]1100},与隋唐时期相较,从脏腑虚热辨证也为数不少,扩大了虚证涵盖的范围。

脏腑辨证的虚实分类法源于《黄帝内经》,书中有关肾脏证的记载不多且散在于各篇中,并无系统论述与归纳,如虚证有肾气虚、肾不足,实证有肾气实、肾气热、肾气逆、肾气盛、肾气内着等。《素问·方盛衰论篇》论五藏气虚:“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,得其时,则梦伏水中,若有畏恐。”^{[5]487}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篇》阐述肾病虚实证的表现:“肾病者,腹大胫肿,喘咳身重,寝汗出,憎风;虚则胸中痛,大腹小腹痛,清厥意不乐。”^{[5]125}《灵枢》则较为简洁地阐述了肾的虚证、实证及论治,如《灵枢·本神》篇说:“肾气虚则厥,实则胀,五脏不安。必审五脏之病形,以知其气之虚实,谨而调之也”^{[6]24},明确提出肾虚证、实证本质是气的虚实,治疗也以调

气为重。之后王叔和《脉经》对脏腑证做了系统整理,皆用虚实命名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《诸病源候论》《千金要方》等均设专卷论脏腑病证,体例上与《脉经》基本一致。这种辨证形式经王叔和确定后一直沿用至宋代,故可以认为其确定了脏腑证的基本辨证模式,在辨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《脉经》脏腑证只收录脉证未记载论治方药,《千金要方》则既有辨证又有论治比较完整系统,是隋唐时期脏腑辨证论治的代表性医籍。《千金要方·第十九卷·肾脏》卷,第二篇论肾虚实证,从脉象到证候表现均引自《脉经》,惟将证名改为肾虚寒、肾实热,补充了方治条文,但数量不多,肾实热证有 3 证 3 方,方有泻肾汤和 2 首无名方;虚寒证仅收载 1 证 1 无名方。

《圣济总录·肾脏门》收录肾脏证的数量则远远超过《千金要方》,肾实证在《千金要方》基础上增为 10 个证方,原 2 首无名方分别赋名为大泽泻汤、榆白皮饮,肾虚证则增为 26 个证方,原无名方赋名为干地黄散。一方面表明《圣济总录》脏腑辨证与《千金要方》的传承关系,另一方面也可见宋以后脏腑辨证越来越受重视,已经较为深入、广泛地参与到临床应用。《圣济总录》肾脏证虚证数量明显超过实证,较为清晰地表现了重视虚证、轻视实证的特点,与肾相关的诸多病证亦皆从肾虚辨证,也是啬肾思想在临证的体现。如《肾脏门》还收录了肾胀、肾着、解休、痞排、肾脏风冷气等 10 余个病证,其中责之于肾气有余、肾气实的仅有解休 3 证和骨实热 3 证,解休主要表现为脊脉痛、气乏不欲言,“此为肾气有余”“肾实而精不运”,用利肾汤、匀气汤、通肾汤^{[1]643};骨实热表现为骨热苦烦、津液内燥,“其气实”,用四物汤、地骨皮汤、秦苳汤^{[1]659-660},其余基本从虚论治,如“肾寒”“肾脏积冷气攻心腹疼痛”“肾脏虚冷气攻腹胁疼痛胀满”“肾脏虚损阳气痿弱”“肾脏虚损骨痿羸瘦”“肾虚多唾”诸篇,皆从肾脏虚损、阳气不足辨证。《圣济总录·肾脏门》以外另有大量病证与肾有关,如虚劳、咳喘、伤寒、风湿痹痛、耳目疾等亦皆从肾虚辨证,极少见到肾实证。

1.3 虚寒与虚热关系的演变

《千金要方》脏腑证的虚与寒、实与热为一一对应关系,虚则为寒,实则为热,虚证称“虚寒”“虚冷”,实证称“实热”,是辨证的一个重要特点,肾脏辨证也是如此。肾脏证中的热性病证表现皆见于肾实热,如舌燥咽肿、汗出、体重骨热、小便黄赤、足下疼热等^{[7]670};肾虚寒证中只见寒证,不见热证,如恶寒、足寒等^{[7]672}。《圣济总录》肾脏证的寒热关系则不然,热性病证不仅见于肾实证,肾虚证中也多次出现,如补肾丸方主治肾脏虚冷、四肢痛,见有“烦热多汗”;肉苁蓉散方主治肾脏虚损和阳道痿弱,见有“五心烦热”;人参补肾汤主治肾虚寒关格,见有“烦热”;补肾磁石丸主治肾虚遗精,见有“体热疲倦”;

螺蛳丸主治肾虚耳聋,见有“小便黄赤”等。《圣济总录》中多处可见脏腑与“虚热”相关联的表述,如《圣济总录·卷第一百三十一·痢疽门·痢疽发背发渴》论痢疽烦渴的机制,为五脏虚热、津液不足。其云:“痢疽烦渴之证,由热气熏灼五脏,津液不足于内也”“津液既耗,热气复盛,则心神内烦而引饮不止,然或为呕哕下利者,以五脏虚热,饮水过度,气不足以胜之”^{[1]1507-1508}。呕哕是气逆所致,下利则为肠胃不固。又如升麻丸主治伤寒咽喉肿塞急痛,病机是“脏腑虚热,毒气攻冲”^{[1]429};羚羊角汤主治眼疹涩赤脉,病机是“肝肾虚热,气壅攻冲”^{[1]1225};其他尚可见心脾虚热、脾肺虚热、心脏虚热、肠胃虚热等概念,虽然尚未进行系统总结讨论,也足以说明宋代脏腑证已不再拘泥于虚寒、实热的对应关系,虚证既有虚寒也有虚热,或许是《圣济总录》五脏证不用虚寒、实热命名的原因。

1.4 重视肾藏精,益精髓为先

肾藏精,藏精功能失常也是肾脏病证的一个主要内容。《圣济总录》将与藏精失常有关的病证归入肾脏证,并提出了肾虚以益精髓为先的治疗思想。精损在宋以前基本包括两类,一是指男子失精遗泄等症,一是指五脏六腑之精损伤而导致的虚损,《千金要方》称为精极。《诸病源候论·虚劳诸病候》收录了几种相关病候,有虚劳少精候、虚劳尿精候、虚劳溢精、见闻出精候、虚劳失精候、虚劳梦泄精候、虚劳精血出候等,病机皆为肾气虚弱不能藏精。虚劳少精候:“肾主骨髓,而藏于精。虚劳肾气虚弱,故精液少也。”^{[8]85}虚劳失精候:“肾气虚损,不能藏精,故精漏失”^{[8]86},以上可以说是狭义的精虚,属于生殖系统病变。精极是六极中的一种,最早也见于《诸病源候论》,《千金要方》谓其为“通主五脏六腑之病候”,若脏腑皆衰则“形体皆极”^{[7]674},其中亦包含了失精遗泄等病症,可为广义的精虚。此书虽然将精极收录入《肾脏卷》,但不在肾虚实二证的范围。

《圣济总录》则将以上病证直接归入肾脏证,主要体现在肾虚证中,收录了如失精、遗泄、阴囊湿痒、虚损、五劳七伤等。肾虚证开首论曰:“肾主水,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,若肾气虚弱,则足少阴之经不利”^{[1]635}。见腰背酸痛、小便滑利、骨枯髓寒、足胫力劣、不能久立等症,具体方证如鹿茸丸主治男子肾脏虚惫、遗泄不时;肉苁蓉散方主治肾脏虚损、精气衰竭、阳道痿弱;五味子丸方主治肾脏虚惫、真元失禁、精自流出;韭子散方主治肾脏虚冷遗泄;沉香饮主治骨肉干枯、阴囊湿痒;黄芪丸主治五劳七伤、诸虚不足等^{[1]636-638}。《圣济总录·补益门》又专设《补虚益精髓》《补虚固精》篇,针对肾精亏虚的病证辨证论治,如《补虚益精髓》篇云:“嗜欲过伤,精髓耗惫,则必用补肾之剂以益之”“若肾虚之证,尤当以益精髓为先”^{[1]2091}。下设 24 条方证,如玉霜丸可续筋骨、

秘精髓、壮阳益寿,主治脏腑虚惫,腰脚痿弱;补骨脂丸补益精髓,安五脏,可除膀胱癰疽、脐胁冷气刺痛;覆盆子丸治五劳七伤、骨髓虚惫,以及九仙丸、巴戟天丸、金锁丸、香茸丸等,皆可补元气、益精髓。《补虚固精》篇主要针对精气不固,失精遗泄者,“皆肾虚也,宜补以固之”^{[1]2095},用以涩去脱之法,下列 13 条方证,如太一金锁丹、还元丸、玉真丸、煨肾附子散、神效散等,可补元阳、固精气、治虚损。其中也包括部分妇科病证,如韭子丸方治肾脏虚冷、梦寐遗泄,并“兼治女人恶露,赤白带下”^{[1]2096}。可见《圣济总录》肾虚证的范围已远超《千金要方》,涵盖了今肾阴虚、肾阳虚、肾气虚、肾精虚等多种肾脏证。

2 阴虚辨证体系尚未建立

《圣济总录》虽然很重视补肾精,但比照元气、元阳、真阳等概念的广泛使用,相对应的元阴、元精、真阴等则未见收录,也未提到真水、真火,仅见有“肾水”“真精”的记载,二者的含义与今也有区别。“真精”见于《圣济总录·卷九十四·诸疝门·蛊病》,此证由脾受风邪、传于肾经、邪热内烁所致,“少腹冤热而痛,真精不守,故其证洩出白液,病名曰蛊”^{[1]1124}。下列 5 个方证皆以“便溺失精”“洩便出白”“精液出白”等为主症,这里的真精主要应指男子生殖之精,并非广义的肾所藏五脏六腑之精,亦非与元气、元阳、真阳相对等的本元之精的术语。

2.1 肾水与肾脏关系考

《圣济总录》的“肾水”之“水”指五行之水,肾又因此称“水脏”,故肾水多为肾脏的代称。如论黑疸的机制是脾传于肾:“肾为水脏,其经足少阴,其色黑,病在肾,故小腹满,色黑”^{[1]747}。在虚劳的病机、治法中数见“水脏虚损”“补水脏”的用法。《圣济总录·卷八十九·虚劳腰痛》中大补益摩膏方治五劳七伤、水脏久冷,见腰膝疼痛、疝气下坠;十补丸治虚劳羸瘦,可补益气血、壮筋骨、暖水脏;《圣济总录·卷九十六·小便利多》中乌术丸补水脏,壮筋骨,止小便。《圣济总录》“肾水”见约 17 处,分别与阴疝、消渴、奔豚、骨痹、脚气、眼疾等病证有关。《圣济总录·卷第一百九·目见黑花飞蝇》论曰:“肾,水也;肝,木也。”又曰:“肾水既虚,肝无以滋养,故见于目者……时见黑花飞蝇,其证如此,肾虚可知也”,治用“益肾水去肝风之剂”^{[1]1270}。下列方证 20 余条,多用防风、羌活、荆芥、菊花、青箱子等疏风清热之品,如拨云散、羌活散、防风汤等。益肾之品多为今温补肾阳者,如附子、巴戟天、肉苁蓉等,滋肾阴药仅有干地黄丸、决明丸、五倍丸、枸杞丸等几方,用到了熟地、五味子、玄参、决明子、枸杞子,可见“益肾水”并非单纯指滋肾阴,也包括温肾阳、补肾气,实质是综合的“补肾”之意。

又如《圣济总录·卷二十·骨痹》,论曰:“是人者,素肾气胜,以水为事。”若“肾水流行,则髓满而

骨强”；若肾气衰，“肾脂枯不长，一水不能胜两火”^{[1]326}。一水指肾，两火指心肝，引《素问·逆调论篇》说：“肾不荣则髓不能满，故寒甚至骨也。”骨痹证属内寒、骨寒，下列5条方证皆以温补为主，少佐滋阴之品，如肉苁蓉丸补骨髓、治寒湿，用药35味，温补之品有肉苁蓉、巴戟天、附子、桂、干姜、黄芪、人参、蜀椒、白术、蒺藜子等，以及大量香燥药如丁香、木香、厚朴、陈皮、槟榔等，滋阴药仅有熟地、石斛、五味子、芍药、山茱萸等几味，在全方占比很少。其余石斛丸、补肾熟干地黄丸、附子独活汤、鹿茸天麻丸、肾沥汤等方基本如此。

2.2 阴虚证与养阴、补阴法考

如前所述，《圣济总录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有关脏腑虚热、精血亏虚等病证，但与现在相同或相近的脏腑阴虚证辨证体系仍未建立，书中“阴虚”概念出现约15处，基本是对阴虚总病机的通论，如“阳盛阴虚”“阳实阴虚”“阴虚则内热”等，未见与脏腑相关联的阴虚证，亦未见有“滋阴”“养阴”的概念。“补阴”见约3处，2处是指针刺法补阴经，1处出自《圣济总录·卷第二十九·伤寒百合》，其中1方厚朴散治伤寒百合病，作用是“补阴养阳”。百合病的病机是脏腑虚损，营卫不足。篇首论曰：“此皆由伤寒及虚劳大病后，腑脏俱虚，荣卫耗弱，不能平复，变成斯疾也”^{[1]418}。厚朴散用药有厚朴、桃仁、杏仁、紫石英、白鲜皮、五加皮、桑白皮多为燥湿药，桃仁、杏仁虽有濡润作用，亦并非今之意义的养阴、滋阴药。本篇其他方剂，如百合知母汤、百合鸡子汤、百合地黄汤、百合柴胡汤等，用到百合、鸡子黄、栝楼根、葛根、麦冬等养阴药，但主治中均未出现“补阴”的用法，篇首论又说：“伤寒百合病者，谓百脉一宗，悉致其病也”^{[1]418}，故而推测厚朴散的“补阴”有可能是滋阴，亦可能是补阴经之意，本方主治信息过少难以进行准确分析。

2.3 肾阴虚证与肾虚证、肾实证关系考

宋以前脏腑证无阴虚证，有关证候除前述虚热证、肾虚证中的部分外，还反映在脏腑实证中，如肾实证的证候表现亦可归入后世肾阴虚范畴。清代张璐《千金方衍义》解析肾实热的3个方证皆为阴虚火旺，第1方泻肾汤：“地黄、磁石滋肾水之真阴”，并比照张仲景少阴病用大承气汤，谓此方为“救热存阴之明验”；第2方大泽泻汤治肾热好怒好忘。张璐说“好怒是龙雷激其壮火”，即指相火妄动；第3方榆白皮饮治肾热小便黄赤，张璐谓此证“良由肾水之亏不能制其阳光，故类聚清热利水之剂以救真阴”^{[9]408-409}。《圣济总录》补充的7个证，主证与《千金要方》的肾实热证基本一致，病证涵盖范围较为局限，以足少阴肾经所过部位病变为主，篇首论“足少阴肾之经，其气实为有余”，见舌燥咽干、咳喘汗出、腰背强急、小便黄赤、腰脊引痛、足胫肿满等症，“此由足少阴经实，或为邪湿所加，故有是证”^{[1]639}。

总体而言，直至宋代脏腑阴虚证的存在状态均比较散，对此类证的认识尚不系统。

3 命门未参与肾脏辨证

理论上《难经》已将肾藏精改为命门藏精，杨上善《黄帝内经太素》也多处讨论命门与精的关系。《黄帝内经太素·卷六·脏腑》云：“命门藏精，精者五脏精液，故五脏藏精”^{[4]63}。与精有关的病证，杨上善也从命门进行解释，如释《灵枢·本神》“恐惧不解则伤精”，谓“恐惧起自命门，故不解伤精也”^{[4]63}。但是关于精失常所致病症，临床医学在辨证上仍然使用肾藏精这一原理，如《千金要方》所记载的命门均指命门穴，与藏精功能无关，《圣济总录》也是如此，命门并未参与辨证论治。书中“命门”见6处，4处为命门穴，2处是在道教典籍《黄庭经》的引文中，如卷二百《神仙服气》论道教服气之法，引用了《黄庭经》的诗句：“玉池清水灌灵根，子能修之补命门”^{[1]2337}。到金·张元素设立命门辨证，如其《脏腑标本药式》以命门“为相火之原”^[10]，藏精生血，主三焦元气，将命门藏精直接与临证衔接，这一思想方始逐渐深化并广泛应用。

综上所述，从宋代始肾已经超越其他脏腑，拥有了本元之脏的地位，在辨证论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按王琦《中医藏象学》肾系辨证，肾阳虚证是“肾阳不足，命门火衰”^{[11]761}；肾阴虚证是“肾阴亏虚，虚热内生”^{[11]762}，宋代肾虚证与今肾阳虚证从理论到辨证相似度比较高，而肾实证则只反映了今肾阴虚证的一少部分内容，肾阴虚证从朱丹溪滋阴思想开始进入全面发展期，至明末命门学说完善而最终成熟。宋代是肾脏辨证理论、方法的重要转型期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赵佶. 圣济总录[M]. 郑金生, 汪惟刚, 犬卷太一, 校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3: 2339.
- [2] 赵佶. 宋徽宗圣济经[M]. 李顺保, 程玫, 校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4: 118.
- [3] 滑寿. 难经本义[M]. 李玉清, 李怀芝, 校注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9: 32.
- [4] 杨上善. 黄帝内经太素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6: 281.
- [5] 王冰.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5: 487.
- [6] 灵枢经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2: 24.
- [7]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[M]. 李景荣, 等校释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4: 670.
- [8] 诸病源候论校注[M]. 丁光迪, 主编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3: 85.
- [9] 张璐. 千金方衍义[M]. 王忠云, 校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5: 408-409.
- [10] 张元素医学全书[M]. 郑洪新, 主编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6: 83-84.
- [11] 王琦, 吴承玉. 中医藏象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7: 761.

收稿日期: 2021-11-13

(责任编辑: 张宇鹏)